

全球南方: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视角和新工具

曾维燊

内容提要 全球南方不仅是国际关系研究的议题,也可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视角和新工具。全球南方根植于世界历史中,其学术概念经历了经济与社会建构、政治与文化批评、国际关系建构三个阶段。世界政治中的全球南方具有多维度性,可以从关系、结构、运动的视角进行理解和比较。全球南方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具有三种工具价值:挖掘“南方”的历史和现实,挑战本体论;考察知识生产背后的权力关系,反思认识论;提供替代性的经验材料,补充方法论。从概念上和操作上说明全球南方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工具价值和学术意义,有助于对全球南方的批判性分析和科学化使用。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全球南方 国际关系 研究工具 分析视角 知识生产

近年来,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成为国际关系领域兴起的研究对象。一些学者开始探索“南方”在世界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南方”和“北方”的政

* 曾维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100871)

** 本文曾在“第十六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和“中国政治学会2023年学术年会”上宣读,获得诸多建设性建议,笔者在此对各位评议人表示感谢。感谢张清敏教授对本文写作的指导,以及《国际政治研究》匿名审读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治与经济关系^①,还有一些学者开始对全球南方的内涵与影响加以分析。^②然而,当前国际关系学界主要把全球南方看作一种研究对象,较少探究其在学理上的工具价值。

全球南方的内涵是什么?如何从理论上理解全球南方?以及全球南方是否可以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与工具?^③全球南方可以为人们理解和阐释国际关系提供新视角和新工具,但挑战是如何具体地使用它。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光斌所指的那样,“只有某种力量(行动单元)把地球意义上的‘世界’联系起来、整合起来并形成一个关系密切的结构,自然地理的世界才能成为政治意义上的世界,或者说才有‘世界政治’之说”。^④全球南方正可以成为解读这种“力量”和“联系”的媒介。这不仅需要在概念上和理论上对全球南方予以理解和澄清,还应该在操作层面说明它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工具价值。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使用定性研究方法,基于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R)和批判国际关系学(Critical IR)的相关基本理论,结合全球南方研究的最新进展,重点考察全球南方的概念内涵、理论意义和工具价值。

一、“南方”:新兴的元范畴

全球性研究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学术界对全球南方形成了统一认识。尽管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研究开始使用全球南方的术语,但他们大多将它视为一种“已知的”或“给定的”概念,而没有对其内涵加以审视。总体而言,部分学者

① Andrew Hurrell and Sandeep Sengupta, “Emerging Powers, North-South Relations and Global Climate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8, No.3, 2012, pp. 463-484; Siddharth Tripath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Global South’: From Epistemic Hierarchies to Dialogic Encounter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42, No.9, 2021, pp. 2039-2054; Imad Mansour, “A Global South Perspectiv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 Vol.18, No.1, 2017, pp. 2-3; Sebastian Haug, et al.,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xamining a Meta Categor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42, No.9, 2021, pp. 1923-1944.

② 国内学界的研究参见周桂银:《全球南方崛起与当代国际秩序变革》,《国际政治研究》2024年第1期,第83—113页;李东琪:《全球南方的源流辨析》,《国际政治研究》2023年第6期,第112—130页;刘德斌、李东琪:《“全球南方”研究的兴起及其重要意义》,《思想理论战线》2023年第1期,第83页;赵可金:《全球南方与中国外交的新议程》,《国际政治研究》2023年第6期,第92—111页;徐秀军、沈陈:《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格局的演变》,《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4期,第64页;孙伊然:《中国参与全球发展议程:意义、举措与挑战》,《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2期,第73页。

③ 刘永涛:《语言与国际关系:拓展政治分析的新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7期,第44页。

④ 杨光斌:《政治思潮:世界政治变迁的一种研究单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9期,第24、25页。

对全球南方存在三种误读:一是将全球南方与其他概念混淆,认为全球南方是“发展中”(developing)“第三世界”(Third World)“非西方”(non-western)的替代;二是对全球南方进行泛化处理,将各种无关的材料填充进全球南方;三是忽视全球南方形成的历史过程,认为它是一种新近出现的现象或概念。

从广义上讲,社会科学中的范畴就是对现象的归纳。^①通过对一些具有共同特征的现象进行归纳,范畴可以使人们比较和分析世界。为了让世界中的地理单元变得可比较,人们很早就开始用不同范畴来划分世界,例如“北美”“地中海”“东亚”。随着这些范畴不断发展,元范畴出现并成为划分全球空间的工具。^②所谓元范畴,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范畴的范畴”。^③元范畴是地理的,但更是历史的。正如其他元范畴一样,“南方”概念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

长期以来,元范畴塑造了人们对全球空间的想象。这些元范畴包括“东方与西方”“中心与外围”“发达和欠发达”等。从根本上讲,这些元范畴都是二分的,即将世界划分为“自我”(self)和“他者”(other)。作为一种新兴的元范畴,“南方”延续了这种二分法。与其他元范畴不同,把世界划分为“南方”与“北方”的做法,将人们对世界的解读同全球性的不平等联系起来。正如一些学者指出,“北方”被塑造成一种富饶、创新、从事知识生产的实体,而“南方”则被想象成缺乏财富和想法的“他者”。^④换言之,“南方”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广大南半球地区,更是一种对(不平等的)国际权力结构的描述。

尽管“南方”是一种新兴的元范畴,但其形成却根植于历史之中。从世界历史或全球历史视角看,将全球范围内的人类语言、文化、习惯联系起来的,是他们之间的网络和联系。^⑤公元1500年以前,这些网络和联系虽然存在,但却相对微弱,且不稳定。地理大发现时代到来标志着世界的各个中心开始被联

^① Sebastian Haug, et al.,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xamining a Meta Category,” pp. 1923-1944.

^②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些学者用“元地理”(meta-geography)来概括这种分析单元。参见 Jochen Cleinschmidt,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the Global South as a Meta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Vol.43, No.2, 2018, pp. 59-80。但“元范畴”(meta-category)是国际关系学者和发展研究学者更多使用的术语,参见 Nikita Sud and Sanchez-Ancochea, “Southern Discomfort: Interrogating the Category of the Global South,”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53, No.6, 2022, pp. 1123-1150; Sebastian Haug, et al.,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xamining a Meta Category,” pp. 1923-1944.

^③ 在中文语境中,元有“基本”的意思,但在英文语境中,元还有“变化”(change)的意思。

^④ Nikita Sud and Sanchez-Ancochea, “Southern Discomfort: Interrogating the Category of the Global South,”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53, No.6, 2022, pp. 1123-1150.

^⑤ Jerry H. Bentley, *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2-14.

系起来,美洲、非洲及亚洲,开始被纳入到近代意义上的“世界”之中。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欧洲成为文明和文化的象征,而世界其他地方则成为一片广大、空白、等待被开发的“无主之地”。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形成掠夺性全球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也随即产生。有学者认为,“南方”的形成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制造差异”(difference-making)的过程。它始于地理大发现,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在这个过程中,全球范围内的历史、地理、时间不断被填充进“南方”,而“南方”也不断地被人为地与“北方”区分开来。

从实践视角看,“南方”发展为全球南方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时代落幕,“发展合作”代替“殖民掠夺”,成为“北方”维护霸权的新工具。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就职演说中,“南方”第一次成为一个实体,即“他们食不果腹,饱受疾病摧残”并且“他们的经济生活原始落后和停滞不前”,而美国则“卓尔不群……仅凭民主制度便能产生富有生气的力量,激励世界各国人民采取胜利的行动”。^①从国际关系维度看,杜鲁门的演讲标志着两个转向:第一,帝国主义式的扩张开始被以“发展”为名义的各种跨国项目和援助政策所取代;第二,欧洲中心的“文明”体系开始被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体系所取代。到1977年,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领导成立“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并在随后发表《南方与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以应对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②至此,“南方”与“北方”的概念被国际社会更加广泛地使用,“南方”在政策上更进一步成为了元范畴。但是,“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南方”和“北方”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发展”或者说“欠缺发展”(underdeveloped)成为后殖民时代区分“南方”与“北方”的最主要标准。^③

“南方”是一个被霸权塑造出的概念,但它却被不断地填充、修改、丰富。1955年,第一次亚非会议(也称“万隆会议”)在印尼万隆召开。万隆会议往往被认为是“南方”这一概念实践化的开端。到20世纪60年代,“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和随后成立的“77国集团”(G77)则标志着“南方”的概念开始走向制度化

^① Harrys Truman, “Inaugural Address,” Harrys Truman Library, 1949, Accessible from <https://www.trumanlibrary.gov/library/public-papers/19/inaugural-address>, 2023-11-03.

^② “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ssues)又称“勃兰特委员会”,成立于1977年,其委员会主席为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委员会当时共有成员21人。参见 https://www.brandt21forum.info/About_BrandtCommission.htm, 2024-10-01.

^③ A. Mbembe, *On the Postcolony*,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p. 3-5.

和常规化。有学者认为,“77国集团”的出现和兴起,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南方”作为一种规范性的力量,出现在现代国际关系活动中。^①在此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范围内出现了许多以“南南合作”与“南南对话”为基础的区域性合作组织。例如,拉丁美洲经济体系(SELA)、海湾合作委员会(即现在的“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西非经济共同体(ECOWAS)等。越来越多的地区性反霸权组织和运动开始在全球各个范围内出现,“南方”的概念显然已经不足以对这些现象加以概括。正是在这些实践中,“全球”逐渐成为“南方”的前缀,全球南方开始更加频繁地出现在世界政治中。从实践的视角看,全球南方的发展过程,既是一个“他者”被建构和被塑造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不断形成的过程。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南方研究大致经历了经济与社会建构、政治与文化批评、国际关系建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全球南方相关的研究和讨论主要围绕经济与社会建构,特别是西方对于作为“他者”的亚非拉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建构。1952年,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第一次提出“第三世界”的概念,指向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欠发达的经济状态和独立自主的政治状态。^②1960年,美国政治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发表《经济增长的阶段》,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六个不同的阶段。为了实现经济“起飞”(taking-off),一国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高积累率、主导经济部门、保证“起飞”的制度。^③然而,这种线性的发展阶段论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看作“放之四海而皆准”(one-size-fits-all)的标准,套用至其他国家上,从理论上否定了其他经济发展模式的可能性。20世纪60年代初,联合国开始使用“发展中国家”的概念,以替代此前西方讨论中的“欠发达国家”概念。^④在此背景下,西方主导的国际开发机构将“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套用于亚非拉国家身上。

^① Sebastian Haug, et al.,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xamining a Meta Category,” pp. 1923-1944.

^② Eugenia Palieraki, “The Origins of the ‘Third World’: Alfred Sauvy and the Birth of a Key Global Post-War Concept,”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online, January 7, 2023, pp. 1-30.

^③ Walt Rostow,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0, pp. 7-15.

^④ 相较于“第三世界”概念,“发展中国家”概念被更加长期地接受和使用。直到今天,多数国家与国际组织依然使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二分法对国家进行划分。具体可参见 Deborah B. L. Farias, “Unpacking the ‘Developing’ Country Classification: Origins and the Hierarchi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nline, August 14, 2023, pp. 1-23; 张云:《从“发展中国家”到“全球南方”国家》,《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10月19日,第7版。

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末,全球南方研究开始进行政治与文化批判。“第三世界”的概念出现并发展后,亚非拉国家接受并改造这一概念。在中国的影响下,“第三世界”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重要地缘政治概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扩张,“南方”的概念逐渐平行于“第三世界”,被越来越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所使用。随着冷战结束,具有强烈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色彩的“第三世界”概念在实践中已不复存在,而“南方”的价值取向彼时又尚不清晰。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开始反思“南方”的概念。第一,地理的和历史的“南方与北方”二分法已经无法准确描述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例如,东欧的一些经济社会欠发达地区不应该被理所应当认为是“北方”;东亚一些快速崛起的国家不再能够被“南方”所概括。第二,“南方”的概念往往暗含的是“北方”对“南方”的掠夺与压迫,而冷战结束后,“南方”内部的经济社会联系,以及“南方”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可以被更好地联结和总结。正是在这些反思中,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南方”的现实意义。^① 全球南方的概念开始流行,全球南方研究开始成型。相比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全球南方研究开始指向反对殖民历史、反对全球性霸权、多样化的发展需求等。

第三个阶段是从21世纪初至今,全球南方研究开始强调此概念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全球南方不仅被用于讨论世界政治之中的结构性不平等,更被用于讨论替代性的权力来源和知识来源,以打破这种不平等。其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巴里·布赞(Barry Buzan)、美利坚大学教授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罗萨里奥大学教授艾琳·蒂克纳(Arlene Tickner)、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秦亚青等学者开始致力于开创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R)。他们主要倡导更加重视全球南方的历史经验,弥补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根本性缺陷。^②

近年来,全球南方被赋予更多关注,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越来越多的公共议题与合作机制被冠以全球南方的称谓,同时,这一元范

^① Robert W.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Penguin, 1985; [美]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郭方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②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Arlene B. Tickner and Karen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Global South: Worlds of Differenc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Yaqing Qin, ed., *Globalizing IR Theory: Critical Engagement*,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畴也愈发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全球南方同样已跃升成为核心议题。^①虽然全球南方的议题价值得到充分的发掘,但其概念内涵和工具价值却有待进一步深入讨论。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全球南方似乎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术语,讨论它的人似乎断定“他人一定知道它的内涵”。一方面,相比于“第三世界”等具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的元范畴,全球南方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这是有待讨论的^②;另一方面,相对于地理意义上的“南方”,全球南方指向的是南方国家的同质性。但如何具体理解这种同质性,以及如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用好这个元范畴,则需要学界进一步深入探究。因此,在概念上对全球南方予以理解和澄清,追溯作为元范畴的“南方”的形成历史,仅是一个开端,要发掘全球南方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工具价值,还需要把概念置于理论之中,探究其在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定位。

二、世界政治与全球南方

世界政治是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的反映,但却不是国际关系,它是全球维度的政治活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认为,国际关系“就好比冰山浮出海面的部分,但它的运动和形状取决于海平面之下的冰川和地壳的运动,即世界范围和各个国家内部的社会运动、经济活动、文化底蕴等”。世界政治研究不仅需要关注外交关系,也需要“从了解各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开始”,即看见“冰山隐藏在海平面下面的部分”。^③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关注世界政治中的变革,分析不同力量增长以及不平衡所带来的结果。^④康奈尔大学教授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则

①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参见 Andrew Hurrell, Sandeep Sengupta, “Emerging Powers, North-South Relations and Global Climate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8, No.3, 2012, pp. 463-484; Siddharth Tripath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Global South’: From Epistemic Hierarchies to Dialogic Encounter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42, No.9, 2021, pp. 2039-2054; Jochen Cleinschmidt, “Differentiation Theory and the Global South as a Meta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Vol.43, No.2, 2018, pp. 59-80。

② 目前,已有学者对全球南方兴起背后的现实政治因素进行分析,参见周桂银:《全球南方崛起与当代国际秩序变革》,第83—113页;马汉智:《“全球南方”视域下的日本对非洲政策》,《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3期,第117—137页;李红梅:《印度的国际秩序观:从“边缘领导”到“全球协同领导”》,《国际展望》2023年第4期,第20—36页。

③ 王缉思:《序言》,载《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北京:中信集团出版社2018年版,第VII页。

④ [美]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2页。

研究世界政治中的“多元多维文明”，挑战了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① 不论采取什么样的路径，解释世界政治实际上就是在解释政治力量在全球维度的运行及后果。

如何理解世界政治中的全球南方？长期以来，有不少理论尝试回答过这个问题。在此，笔者将抽象的概念放入这些理论之中进行比较，以说明全球南方在世界政治中的不同属性。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全球南方具有多维性（multidimensionality）。因此，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和科学化使用是必要的和重要的。具体而言，全球南方可以分别被视为世界政治中的关系、结构、运动，详细分析如下：

（一）作为关系的全球南方

世界政治中的全球南方首先是通过关系显现出来的。人类在世界中相互联系，并在联系的过程中通过诸如阶级、种族、性别等身份区分彼此，这是关系视角的基础。15世纪以前，“种族”概念并不存在。地理大发现之后，随着西方的扩张和殖民主义兴起，种族逐渐被塑造成一种生物意义上的结构，随后被赋予社会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南方”不断形成，并进入到世界政治之中。逐渐地，“南方”成为“黑暗、落后、野蛮”的代名词，而殖民扩张则被粉饰为“文明的传播”。有学者认为，这种趋势不断延续，全球南方在今天指向的是一个在经济社会意义上边缘化的世界。^② 例如，世界银行按照收入水平，将世界分为“低收入”“中等偏下”“中等偏上”“高收入”四个部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则将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进行排位，提出“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只有少数指数“极高”的国家，才能被认为是“发达国家”。这些划分世界的方法衍生于同一套逻辑，继承了“中心”国家对他者的区分。如果说早期的“南方”是在殖民掠夺中形成的，那么，今天的“南方”则是在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被塑造的。

世界政治中的关系并不是“南方和北方”的关系，而是通过“南与北”“东与西”“发达与欠发达”等二分法体现出来的“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这里的“自我”，往往是享有特权的、白人为主的、具有男性气质的、传统扩张性国家，而“他者”则没有准确定义。换言之，只要不属于“自我”的存在，往往都被

① [美]卡赞斯坦：《世界政治中的文明》，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0、31、40页。

② Sebastian Haug, et al.,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xamining a Meta Category," pp. 1923-1944.

放入全球南方的范畴之中。通过这种异化,“自我”的属性不断增强。巴黎高等研究学校教授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场域(field)是各种位置之间客观存在的网络,在这个网络(即场域)之中,行动者区分彼此,找到自己的位置。^①类似地,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进一步完善了社会学中的“关系结构”理论。在他看来,社会行动实际上是以不同形式连接在一起网络节点之间的互动。从此意义上看,世界政治就是关系网中具有不同特征的“自我”和“他者”的互动关系。

“南方”原本是一种被强加的印象,但亚非拉国家却接受、利用并且修改与之相关的概念、话语、叙事,形成了一种全球南方的集体意识和共同身份。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概念被提出后,逐渐取代“欠发达国家”,成为联合国和众多国际开发机构的官方用语,从而被广泛地使用。与此同时,亚非拉国家和地区也很好地接受这一概念,并基于自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经验,将其补充和完善。^②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发展中国家”已不再单纯用于划分国家类型,而成为亚非拉国家追求发展、公平、团结的集体身份和认同。2015年,联合国提出“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涵盖“减贫”“性别平等”“气候行动”等17个具体领域,为全球南方国家实现中长期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参考和借鉴。^③

然而,应该看到,全球南方从“他者”转向“自我”的过程,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南方的主体意识和身份认同也是在不断变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南方身份认同的基石是它们被殖民的共同历史。在此基石之上,全球南方的集体意识主要指向反对殖民主义、促进民族解放、促进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加强对亚非拉国家的分化与控制,加上亚非拉国家内部的冲突与矛盾,全球南方的身份认同开始削弱,全球南方的内涵逐渐模糊。^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后才有所变化。进入21世纪后,新兴经济体积极推动多边主义发展,国际关系走向社会化和民主化,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再次强调基于“发展”的身份和认同,全球南方开始被注入新的内涵。^⑤与此同时,亚非拉国家内部的区域一体化建设加速,东盟等区域一体化组织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全球南方开始指

① [法]布迪厄:《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② Deborah B. L. Farias, “Unpacking the ‘Developing’ Country Classification: Origins and the Hierarchi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nline, August 14, 2023, pp. 1-23.

③ 有关“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介绍,参见联合国官网 <https://sdgs.un.org/2030agenda>。

④ 周桂银:《全球南方崛起与当代国际秩序变革》,第83—113页。

⑤ 李红梅:《印度的国际秩序观:从“边缘领导”到“全球协同领导”》,第20—36页。

向本土的、自主的、基于经验的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

(二) 作为结构的全球南方

全球南方形成的过程是世界政治中“南方”与“北方”分化的过程。然而，只有在世界政治结构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全球南方是如何进一步运转的。国际关系研究转向关注世界政治，本质上是将世界视为一种结构。这种结构是历时性的，但也是结果性的。^① 作为“结果性的结构”，世界政治实际上是“地理世界”被政治塑造的结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光斌认为，世界政治在历史形成过程中产生“深层结构”，它无时无刻不在约束着行为体的行为，并且时刻充当着行为主体的角色。“深层结构”被从不同角度解释出来，如耶鲁大学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巴里·布赞的“国际体系”、塞缪尔·亨廷顿的“世界秩序”。不论在什么层次分析世界政治，都离不开对世界政治本身的“深层结构”进行说明，而全球南方则是解释“深层结构”的又一视角。

从结构视角看，全球南方是相对于先进的、发达的、核心的“北方”而言的外围。在此视角下，“北方”对财富与技术的控制不仅促进自身的发展，还限制“南方”的转型。这种观点和一系列批判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有紧密联系。对世界政治不平等结构最经典阐释来自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1949年，普雷维什向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递交了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在此报告中，他将世界经济看作是一个整体性的结构，而在这个结构中，存在着“中心”和“外围”，即“大的工业中心”与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外围”。在“中心—外围”的世界性结构中，生产关系不仅不是互利的，反而是压迫性的。在他看来，技术进步的外溢一直是不平等的，因为“这有助于使世界经济因为收入增长结果的不同而划分成中心和从事初级产品生产的外围”。^②

“南方”与“北方”的结构正是在这种生产不平等关系中深化的。而理解世界政治，实际上就是理解根植于世界历史中的“中心与外围”“南方与北方”“控制与反控制”关系。在依附论者看来，不平等关系不仅不是自然形成的结构，而是“北方”的政府与跨国公司共同塑造和维护起来的。早期的“依附论”者认

^① 杨光斌：《政治思潮：世界政治变迁的一种研究单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9期，第24—25页。

^② Raúl Prebisc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ica*, Vol.7, No.1, 1962, p. 1.

为,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南方”无法自主地产生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但随后的“依附论”者(即一些依附发展理论学家)认为,尽管“中心—外围”的世界政治结构不会改变,但国家在体系中的位置却是可以改变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分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过程,认为“外围”国家可以升为“半外围”国家甚至“中心”国家,而“中心”国家也可能下降为“半外围”甚至“外围”国家——依附性的发展是可以实现的。^①总之,“依附论”所要解决的中心议题是探讨“南方”国家如何解决不平等的发展与依附问题,他们的讨论从表面上看呈现出“经济中心主义”,但本质上却是对世界政治中权力结构的深刻分析。

在“依附论”与左派发展理论提出后的几十年里,学术界与政策界开始更加关注权力与生产不平等背后的规则性、制度性、知识性不平等。例如,斯坦福大学教授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通过对世界银行在非洲国家莱索托 1978 至 1982 年间发展项目的考察,指出世界银行在国际发展领域的知识霸权和制度霸权。弗格森认为,世界银行的规范性权力使得它以一种“理所当然”的状态出现在国际发展领域中,这导致世界银行很多政策和项目的失败。^②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则对国际发展组织进行批判性研究。在他看来,依托于国际组织而存在的有关“发展”的话语同殖民话语一样,都通过建立某种霸权话语体系,从而“剥夺其他思维方式出现的可能”。^③相比于物质性权力,基于知识和价值的霸权往往更加稳定,也更难以被颠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国家成功地实现经济发展,但全球南方背后的结构性不平等依旧没有消除。一方面,已实现发展的“北方”常常制造“富国陷阱”(kicking away the ladder),以阻止南方国家使用更加有效的政策工具;^④另一方面,已经基本结束的全球疫情也再次说明,全球南方被阻隔于资本和技术之外,仍然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此外,还有学者指出,全球南方要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力,仍然面临外部干扰过大、机制化平台不足、诉求多样化等挑战。^⑤这些事实告诉人们,体现着世界政治不平等结构的全球南方,仍然是

① [美]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郭方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 页。

② Ferguson, James, *The Anti-Politics Machine: "Development", Depolitic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③ Escobar, Arturo,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④ Ha-Joon Chang,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them Press, 2002, pp. 7-9.

⑤ 徐秀军、沈陈:《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格局的演变》,《国际问题研究》2023 年第 4 期,第 64 页。

理解世界政治的重要视角。

(三) 作为运动的全球南方

以上两种理解,主要描述的是“南方”如何在世界政治中“被塑造”和“被固定”。然而,“南方”却并没有对关系性和结构性的霸权屈服,相反,全球南方也将世界政治中的边缘性力量联系和团结起来。它作为一个跨地域、跨文化、跨时间的政治力量,长期反对和抵抗霸权。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的批判主义理论通过对历史和文化的解析,指出社会运动和反抗力量在全球社会变革中的关键作用。以约克大学教授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为例,他的历史结构理论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思想,认为社会变迁其实是通过历史结构实现的,而结构又由物质、思想、制度三个要素组成。正是由于现有结构存在内在矛盾和外在压迫,社会运动和反抗力量才得以出现。因此,反霸权运动实际上是尝试通过建构替代性的物质、思想、社会结构,从而建立一种新的权力关系。^①除此以外,社会科学理论存在很多关于抵抗性全球南方的论述。笔者主要指出作为运动的全球南方三种类型。

首先,全球南方代表了以往受压迫的“他者”不断进行的政治斗争。以奴隶制废除为例,人们一般认为,“北方”的理性启蒙与政治运动导致奴隶制解体,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世界上的第一个反奴隶制革命于1791年发生在法属殖民地圣多明尼加。彼时,当地的黑人种植园努力不畏暴力,为自由而战,反对他们的“白人主人”。1798年,他们又击败英国军队,刺激了英国正在进行的废奴运动,加速了1807年英国废除《奴隶贸易法案》。尽管受压迫的“南方”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但是,直到近期学术界才开始重新审视他们的贡献。^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一种更具实质性的团结和抵抗运动,全球南方开始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在1955年4月18—24日召开的万隆会议中,全球南方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以中国为例,尽管美国等“北方”力量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并渲染中国“夺取亚非世界的领导权”,中国代表团顶住压力,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为建立和加强中

^① Robert W.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International, 1971.

^② Nikita Sud and Sanchez-Ancochea, "Southern Discomfort: Interrogating the Category of the Global South,"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53, No.6, 2022, pp. 1123-1150.

国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创造了条件。这种以“南方”为主体的斗争传统和政治呼吁一直持续,在今天的世界政治中发挥着重要力量。例如,“77国集团”就是旨在国际经济领域内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推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在不同历史阶段,这些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反对殖民与反对霸权的革命、战争、运动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全球性反抗力量与进步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①

其次,全球南方也代表一种对西方文化霸权和知识霸权的批评,特别是对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生产的批评。广义而言,“北方”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国家,相反,“北方”是霸权的统称。在世界政治中,“北方”反映着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而且对他们进行有目的的政治和社会构建。换言之,从全球南方视角看,世界政治不仅是物质与观念斗争的场所,还是国家之间争夺“对秩序的构建”的过程。全球南方不仅抵抗以国家和国际组织为载体的“北方”,还抵抗根植于全球性秩序之中的“深层结构”。从学科意义上讲,世界政治是关系性的和结构性的,不仅根植于全球性的霸权之中,而且背后还有最为重要的知识生产。全球南方对西方中心知识生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一批来自“南方”的社会科学家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上重新理解主流的社会科学理论,提出种种批评,建立替代性的理论和分析;第二,主流的社会科学理论也开始更加关注全球南方所蕴含的经验现象,开始反思自身理论赖以生存的“(西方)历史”的局限性。

最后,全球南方还代表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尝试。在贸易与金融领域,全球南方对霸权的反对更加直接和剧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的石油勘探、开采、销售几乎完全被“北方”的石油公司垄断,其结果是发达国家获取超额利润,而“南方国家”的经济利益却受到损害。为抵抗这种“石油霸权”,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欧佩克”的阿拉伯成员国成立另一个组织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rganisation of Arab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APEC),以向以色列施压。1973年,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对美国、西欧和日本实施石油禁运,给“北方国家”带来巨大压力。正是在这一时期,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逐渐获得其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

近年来,全球南方对世界政治格局中全球性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霸权

^① Carl Oglesby, "Vietnam Has Failed. The Revolution Can Only Be Mauled, Not Defeated," *Commonweal*, Issue 90, 1969, pp. 11-12;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217-228.

提出进一步的挑战。以多边开发性金融为例,长期以来,“北方”所主导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多边开发性金融范式深刻影响着全球多边开发性金融格局。为从捐资国获取贷款,全球南方中的国家往往需要根据“北方”的标准改变国内的政策。有学者指出,“北方”主导的范式不仅体现出对“南方”的不信任,也没有办法满足它们国家能力建设需要。近年来兴起的“南方”主导的多边开发银行开始实行更加贴合全球南方现实的贷款政策,在项目设计、咨询、监督等方面允许贷款国最大程度地使用本国的政治法律系统。^① 这种趋势反映了世界政治在跨国金融层面的暗流涌动。^② 总之,作为运动的全球南方在世界政治的运行中体现出巨大潜力。

三、作为国际关系研究工具的全球南方

全球南方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相互交叉,但不完全相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全球南方常常作为议程与议题出现,但很少被用作视角与工具。换言之,“南方”这一“元范畴”的工具价值,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是值得被进一步探究。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全球南方是研究全球权力结构的主要脉络之一。不仅如此,它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有独特作用。挖掘全球南方作为一种视角和工具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意义是一项极具潜力的工作。这种跨学科的努力强调对全球南方进行批判性分析和科学化使用。它不仅将全球南方添加到国际关系研究的工具箱中,也有助于学界对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生产进行反思。

全球南方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工具价值是多方面的。从总体上看,全球南方把“南方的”“边缘的”“非西方的”现实放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强调这些经验现象是构建国际关系理论和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的工具。因此,它可以促进更具反思性、批判性、补充性的国际关系研究。具体而言,结合目前学界对全球南方和国际关系研究的讨论,存在几种看法。在本体论上,全球南方没有构建起一套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没有像“关系主义”一样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分析单元。但是,它指出以西方历史经验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的本体论问题。例如,几大主流理论中“国家”的概念都基于1648年以

^① Kevin Gallagher and Fei Yuan, “Standardiz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Comparison of Development Banks in the Americas,” *Journal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Vol.26, No.3, 2017, pp. 243-271.

^② Ibid.

后欧洲的历史,但用这一概念分析全球南方的现实却显得捉襟见肘。^① 在认识论上,尽管国际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国家间关系,但对绝大多数国际关系的观察者和研究者而言,他们所接收的实际上是以“北方国家”为基础的理论 and 实践建构出来的“国际关系”。在方法论上,研究者对国际关系观察和分析时,主要还是依赖西方中心的历史材料,例如,“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布雷顿森林体系”等,这导致现有国际关系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欠缺。除此之外,在价值论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实际上是“北方”知识霸权下的产物。它们不仅不是所谓客观的,反而是带有明显价值取向。

具体而言,全球南方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与工具,具备三个维度的价值:挑战本体论、反思认识论和补充方法论,三者之间是逐层递进的关系。

(一) 挑战本体论

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就是关于“国际关系”存在及其本质的学说。一种理论一旦在本体论上发生动摇,其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也会随之改变。包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经典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是“历史上突然出现的”西方经验。^② 在它们的体系中,全球南方仅仅是以西方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的衍生品,即全球南方在向“北方”索取理论,这显然不能满足不断丰富化的国际关系研究需求。

在人类历史上,“中心国家”政治发展所产生的思想与话语体系,往往会被“中心国家”作为实时性的国家利益对外推广,从而使得一种地方性知识成为全球性思潮。有学者指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迫切需要对其赖以生存的本体论进行反思,以满足其“普适性”的需求。^③ 还有学者认为,不管是“东西”,还是“南北”之间的对立,都不符合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趋势。相反,超越文化壁垒、推动“全球性”理论的形成,才是理论创新的方向。^④ 这些批评很好地指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本体论方面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借助全球南方这一工

^① Imad Mansour, “A Global South Perspectiv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 Vol.18, No.1, 2017, pp. 2-3.

^② Siddharth Tripath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Global South’: From Epistemic Hierarchies to Dialogic Encounter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42, No.9, 2021, pp. 2039-2054.

^③ Imad Mansour, “A Global South Perspectiv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 Vol.18, No.1, 2017, pp. 2-3.

^④ 高程:《历史经验与东亚秩序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视角》,《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第18页。

具,不论是主流的还是批判性的国际关系研究都可以更加深入地思考下列本体论问题: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国际关系是客观存在的现象,还是一定环境下政治互动的产物?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争夺的是什么?更进一步讲,“国家”应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分析单元吗?如果不是,那应该是什么?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适用范围在哪里?

本体论建构是建立在经验材料之上的。作为一种增补经验材料的工具,全球南方不仅可以带来国际关系研究视野的拓宽,也可以带来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创新。第一,可以用古老而经典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解释全球南方中零散的、广泛的、各不相同的国际关系(甚至是人类学、社会学的)现象。例如,尽管亚马逊雨林中的各部落虽然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但却可以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它们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或者生活在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的鄂温克群体长期存在迁徙和贸易的传统,对他们来说,西方生产的“主权”“领土”“边界”意义有限,流动性的“关系”和作为价值“传说”才能更好地解释他们的行为。^①第二,可以使用全球南方中替代性材料来修正或拓宽经典国际关系理论。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观、国际秩序、国际交往维度中的基本概念和主要观念,可以被用于挑战经典的国际关系理论,甚至产生新的国际关系理论。^②例如,剑桥大学教授阿耶·扎拉科尔在《西方之前:东方秩序的兴衰》中提出了以蒙古帝国秩序为原点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补充和挑战现有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③尽管有很多学者强调,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全球南方视角应该与经典国际关系理论保持距离,以避免被知识霸权“收编”,但事实上,主流理论与边缘理论是相互促进和相互构建的关系。通过对替代性经验材料的分析,是对经典理论的假设、边界、应用范围进行修正,但这并不意味着需要从根本上否定它们。

^① 本体论创新的重要维度是基本概念和基本观念的创新。全球南方各个地区和国家有关“世界”“秩序”“交往”的概念和观念对本体论创新具有借鉴作用。在这个维度,一些学者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参见 Arlene B. Tickner and Karen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Global South: Worlds of Differenc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20。此外,刘德斌与李东琪的论述也涉及这个方面,参见刘德斌、李东琪:《“全球南方”研究的兴起及其重要意义》,第83页。

^②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Arlene B. Tickner and Karen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Global South: Worlds of Differenc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Yaqing Qin, ed., *Globalizing IR Theory: Critical Engagement*,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③ Ayşe Zarakol, *Before the West: The Rise and Fall of Eastern World Ord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然而,在国际关系领域,所有的叙述活动都是政治活动,理论建设也是如此。^①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选取什么材料和不选取什么材料,如何分析材料,如何呈现材料,都是政治性选择的结果。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一些批判性国际关系理论,本质上都是基于西方经验材料的理论建设。或者,即使一些全球南方的历史和现实被纳入讨论,本质上都是围绕西中心展开的。特别是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而言,清醒地认识到这些与本体论有关的结构性问题,透过全球南方找到本土经验中的连贯性与自洽性,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国际关系的理论创新是艰巨的,因为它要求研究者在本体论上有所突破,并与根深蒂固的“常识”观念分裂。这是全球南方的重要工具价值之一。

(二) 反思认识论

国际关系研究不仅依据历史和现实创造理论,也对理论形成的过程进行批判,即创造“理论的理论”。知识生产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深层结构”,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绕不开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问题。如果说国际关系经常以政治、经济、文化冲突形式表现出来,那么,在更深的维度中,它是围绕知识生产展开的竞争。物质的或者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优势界定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位置和影响,而知识的或者说“理论的和话语的”实力则决定它对其他国家的长期影响。相比于物质结构性不平等,知识结构性不平等更加隐蔽,因此也更难观察。但是,这不意味着它不存在或者不重要。

从根本上讲,虽然国际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国家间的关系,但人们所认知到的“国际关系”却是一定环境下政治、文化、社会互动的产物。同理,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基于“理论”的“研究”,也是一种依赖主观选取的材料所进行的社会构建和文化构建。尽管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冲突常常以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差异为表征,但在源头上,这种冲突是对不同历史材料处理的结果。如果说理论决定了人们观察世界的位置和方法,那么,历史材料则决定人们“观察什么世界”。构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就是在过去百年西方错综复杂权力关系环境里并通过这些关系实现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工具,全球南方既可以被用来“加强权力不对称”,也可以“削减它”。^② “南方”本身就是国际关系历史和现实的组成部分,但

^① 刘永涛:《语言与国际关系:拓展政治分析的新视角》,第44页。

^② Nikita Sud and Sanchez-Ancochea, “Southern Discomfort: Interrogating the Category of the Global South,”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53, No.6, 2022, pp. 1123-1150.

脱离“南方”存在的语境,人们就无法解释它在国际关系中的位置。因此,通过全球南方来构建国际关系研究,总结国际关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践,需要对构建全球南方的语境有更加具体的认知。具体而言,尽管全球南方可以被用作工具,将全球范围内分散的经验现象连接起来,以服务更宏观的一般性分析,但有两项工作是必不可少的:第一,对全球南方内涵进行以学科为基础和以议题为基础的批判性讨论。^①如前文所述,全球南方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在不同语境中,不同人对它会有不同理解。因此,在使用这一工具时,有必要对其具体内涵进行说明;第二,对全球南方背后的不平等国际关系权力结构保持清晰的认知。正如“东方”“发展”“国际社会”等术语一样,全球南方是一种国际关系中权力运动的延伸,全球南方也是西方知识霸权的产物。研究者不应该将其盲目视为价值中立的研究工具。

(三) 补充方法论

元范畴不仅使世界在地理、时间、政治上可以比较,它还推动研究者关注国际关系背后更加深层的关系、结构、运动。从“东西”到“南北”再到“全球”,人们借以研究国际关系的元范畴不断在更新,这也意味着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不断拓展。一些研究讨论了全球南方在国际关系理论知识生产中的反霸权作用,其观点可以被简洁地概括:“北方”或者说国际关系中的主导性权力对知识生产进行控制,这不仅是知识本身“适用性”的问题,也是全球性政治经济结构的问题。在知识生产霸权中,不仅全球南方的差异被建构起来,全球南方内在的历史和现实也被边缘化,被认为是“非历史”和“非现实”的。知识生产霸权是一种服务于“北方”的霸权。它不仅仅是影响,而是决定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现实”的解读。全球南方有望成为打破这种霸权的工具之一。换言之,全球南方想要争取从压迫中解放,就应该进行自身的知识生产。这种观点不仅被讨论,也成为很多学者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立场。^②

作为工具,全球南方的方法论价值的作用是显著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将“南北关系”“南南合作”“南北合作”等作为

^① Sebastian Haug, et al.,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xamining a Meta Category,” pp. 1923-1944.

^② 主要参见 Albert Sanghoon Park, “Does the Development Discourse Learn from History?” *World Development*, Vol.96, 2017, pp. 52-64; Melisa Decianci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South: A Regional Research Agenda for Global I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8, No.1, 2016, pp. 106-119.

视角,以概括和分析国际关系中的实践。^①进一步讲,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讨论较多的“崛起国”“中等力量”“世界秩序”研究,实际上也是这种研究趋势的体现^②;第二,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将全球南方的不同经验现象联系和总结起来,以补充、修正、挑战传统研究,开启新的研究领域。^③许多跨学科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可以被划入此类。把全球南方作为分析视角和工具,可以为国际关领域的实践研究提供主题创新。例如,国际关系研究中全球南方是否一定要以国家作为划分的界限?如果崛起中的印度、巴西、中国是“南方”的一部分,那么,北美和西欧落后的边缘化地区是否也是“南方”?中国和希腊的国际金融合作是一种“南北合作”还是一种“南南合作”?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历史浮现在研究者眼前,学界开始讨论构建替代性的国际关系理论。^④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崛起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也引发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思考中国历史材料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适用性问题。然而,一般性理论不仅要求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创新,更必须包含科学的、具有边界的、可以使用的分析工具。此外,颠覆现有的全球性知识权力结构也并不容易。

以上所讨论的三种有关全球南方的工具价值,在学界较为流行普遍。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界,不少学者也对学科的知识生产进行批判性讨论。^⑤例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翟崑认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需要有学科的知识形态支撑,且不可能“按照霸权国指给中国的路径退出知识生产竞争者的行列”。这要求区域国别学不仅在主题上有所创新,更要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技能上有所突破。^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李开盛认为,当前中国的“学派性”研究和“非学派性”观点,呈现出“独行侠”和“集团军”齐头并进的现

① 李小云等:《南南合作:中国的实践与贡献》,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版;郦丽、徐秀丽:《更趋平行的全球卫生治理新图景:全球南方的视角》,《太平洋学报》2023年第5期,第53—65页。

② 石斌:《新型大国崛起与全球秩序变革》(十卷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张宇燕:《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格局:三超多强?》,《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期,第1、2、5页。

③ 周桂银:《全球南方崛起与当代国际秩序变革》,第83—113页;Nikita Sud and Sanchez-Ancochea, “Southern Discomfort: Interrogating the Category of the Global South,”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53, No.6, 2022, pp. 1123-1150.

④ 李东琪:《全球南方的源流辨析》,第112—130页;刘德斌、李东琪:《“全球南方”研究的兴起及其重要意义》,第83页。

⑤ 唐士其:《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属性》,《学术前沿》2024年第2期,第27、28页;杨原:《经验困惑、多样性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路径》,《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2期,第24、25页;高程:《历史经验与东亚秩序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视角》,第18页。

⑥ 翟崑:《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第27页。

象,这是值得抓住的机会。^①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丰提出,在强调中国经验和文化传统特殊性的同时,也应注重“社会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和共通性”。^② 总之,围绕全球南方所展开的对全球性知识生产讨论正在加速进行。^③ 全球南方在知识生产维度的工具价值不应该被忽视,这对国际关系研究来说尤其是如此。

结 语

探究全球南方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工具价值,目的在于拓宽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和补充国际关系研究的工具箱。这种尝试有别于仅仅将全球南方看作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现象或一类对象的做法。从全球南方实践与理论出发,也有助于启发具有批判性和替代性的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补充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具有缺陷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简言之,尝试阐释全球南方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工具价值,不仅有助于批判和反思知识生产,更是一种建设性的跨学科努力。

本文从概念上和操作上说明将全球南方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学术意义。从概念上看,“南方”不仅是地理的,同时也根植于人类历史之中。这意味着它不是“取之即用”的术语,而是具有多重内涵的元范畴。想要理解全球南方的多重内涵,应该把它放回到人类发展历史和世界政治的变迁中。因此,本文分析了三种世界政治中的全球南方,即作为关系、结构、运动的全球南方,它们是彼此联系的关系。从操作上看,全球南方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视角与新工具,至少具备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维度的价值。发掘全球南方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工具价值,并对全球南方创造性、批判性、科学性的使用是本文的着眼点。

① 李开盛:《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知识社会学分析》,《云梦学刊》2020年第4期,第9、11、12页。

② 刘丰:《概念生成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4期,第25、26页。

③ Melisa Decianci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South: A Regional Research Agenda for Global I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8, No.1, 2016, pp. 106-119; Arlene B. Tickner and Karen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Global South: Worlds of Differenc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除此以外,国内外学术期刊曾多次以专题组稿的形式讨论全球南方对(国际关系研究)知识生产的意义,例如,《第三世界季刊》2021年就曾推出系列文章,除剑桥大学副研究员塞巴斯蒂安·豪格(Sebastian Haug)等人的导论之外,还有9篇文章从法律、气候、治理的视角切入议题。

近年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科呼声愈来愈高,^①这与发掘全球南方的工具价值趋势是契合的。然而,在此过程中,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有必要对全球南方这一概念兴起和发展的驱动力进行持续的思考。例如,全球南方自1969年提出后,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但为何在近几年热度飙升?这需要进一步对全球南方背后的政治动力、经济动力、文化动力进行考察;^②第二,作为工具和视角的全球南方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有一定局限性。例如,目前,学界广泛讨论的全球南方研究同现存的一批南南合作研究、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研究有何异同?全球南方内部是否也存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第三,任何社会科学的工具与视角都是具有价值取向的。在使用这些工具、透过这些视角(如全球南方)的同时,研究者应该保持对它们背后不平等权力结构的认识,并审视研究者自身在全球性知识生产中的位置。总之,在全球南方不断在学术研究中兴起的今天,忽视它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价值和作用显然是一种欠缺。全球南方可以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新发力点。

^① 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69页;高尚涛:《关系主义与中国学派》,《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8期,第116页。

^② 周桂银:《全球南方崛起与当代国际秩序变革》,第83—113页;马汉智:《“全球南方”视域下的日本对非洲政策》,第117—137页;李红梅:《印度的国际秩序观:从“边缘领导”到“全球协同领导”》,第20—36页。此外,2023年12月在清华大学开展的“百年大变局下的‘全球南方’”全球发展论坛也着重讨论全球南方热度提升背后的现实政治因素。